

文明乡风建设视域下财政薄弱乡镇文化志愿服务 的维系机制

——基于吴桥镇的田野考察

汪李睿，白子弋，林芷怡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南京

摘要 | 在文明乡风建设的背景下，受制于城乡资源供给差异，财政薄弱乡镇在缺乏常态化经费的条件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难题。本文以文明乡风建设为具体视域，以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吴桥镇文化志愿协会为田野个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法，考察其在缺少本级常态化财政拨款、志愿者无固定劳务报酬条件下实现十余年持续运行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协会构建了以党建引领与组织化、专业晋升、表彰与媒体传播为核心的三重维系机制：党建引领与制度规范提供组织归属和运行载体，专业晋升通道将无偿奉献转化为体制化身份认可，表彰与媒体传播在熟人社会中放大志愿者的社会声望。三者共同以乡土社会内部稀缺的“身份—声望—归属”资源替代物质报酬，形成低成本、内生性的文化服务供给路径，为同类财政薄弱乡镇培育文化志愿组织、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提供了实践参考。

关键词 | 文明乡风建设；文化志愿服务；维系机制；财政薄弱乡镇

Copyright © 2026 by the author(s).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要求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为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与基层公共文化实践

指明方向。在乡村振兴战略走向深化的时代语境下，文明乡风建设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维度，在淳化乡土社会伦理、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中的价值愈发凸显。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是推动文明乡风建设落地的重要实践载体，其供给质量直接决定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成效。但审视广大财政薄弱乡镇的现实场域，基层文化建设长期受制于多重结构性约束：财政保障力度不足、本土文化专业人才匮乏、

作者简介：汪李睿，南京农业大学，主要从事乡村文化方向研究。

文章引用：汪李睿，白子弋，林芷怡. 文明乡风建设视域下财政薄弱乡镇文化志愿服务的维系机制——基于吴桥镇的田野考察[J]. 澄启学刊, 2026, 1 (4) : 140-146.

<https://doi.org/10.68070/bvgy7t73>

市场化文化供给发育迟缓。传统的政府单向输送的公共文化模式，已经难以回应乡民日趋多元的精神文化诉求^[1]，文明乡风建设也因此遭遇现实梗阻。

为破解基层公共文化供给的现实困境，文化志愿服务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被寄予补齐乡村文化短板的期待。但现实层面，乡镇文化志愿组织普遍存在组织化不足、存续能力薄弱的问题，尤其在公共文化经费约束较强的乡镇，志愿队伍松散、活动碎片化成为常态，很难形成稳定可持续的供给模式。吴桥镇文化志愿者协会则提供了一个颇具分析价值的经验个案：该本土志愿组织自 2013 年成立，在缺少本级常态化财政拨款、志愿者不享有固定劳务报酬的条件下运行十余年，下设 18 个专业分会，常态化开展公益巡演、非遗传承、困境群体帮扶等文明实践活

动，成长为当地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行动主体。由此引出本文核心问题：在公共文化供给财政约束的乡土场域之中，当制度性物质激励缺失时，文化志愿组织依靠何种机制实现志愿者留存、组织存续与公共文化持续供给？对该问题的剖析，既能够丰富基层文化治理、志愿服务维系的经验研究，也可为同类财政薄弱乡镇培育文化志愿力量提供可参照的实践路径。

1 文献综述

国内学界对于乡风文明建设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时期的乡风文明研究的核心议题聚焦于：在物质基础相对薄弱、农民文化素养有待提升的乡土社会，如何依托政府主导的文化阵地建设、主题活动与移风易俗工作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2-6]。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方略，乡村振兴是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升级，其本质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依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7]。文化是乡村各项事业发展的根基，加快乡村文化建设既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深化乡风文明建设、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手段^[8]。面临农村存在道德滑坡、封建迷信等系列活动，亟须从体制机制入手加以破解^[9]。

步入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涉及价值体系、乡村文化、社会风俗、行为习惯等多重维度，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系统性实践活动，被赋予新的内容要求，并具有以推动乡村振兴来缓解乡村相对贫困的重要现实价值^[10]。近年来，资源约束成为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财政薄弱乡镇

的文化建设困境得到更多关注。宏观维度来看，乡风文明建设常遭遇基层政府职能缺失、主体缺位、举措缺乏等现实难题^[11]。微观层面上，受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部分地区依旧存在文化阵地薄弱、集体文化活动匮乏、陈规陋习存续、专业人才短缺、财政投入不足等现实问题，并据此提出加强基层党建、开展文化活动、优化财政结构、推进移风易俗等对策^[12]。上述研究表明，财政薄弱乡镇的文化服务供给受资金、人才、场地、组织渠道等多重条件约束，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投入难以充分满足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亟须发掘低成本、内生可持续的行动主体参与乡土文化建设，文化志愿者由此进入乡镇文化建设的研究视野。部分研究从志愿者参与动机与服务绩效展开讨论，发现社会责任感与公共价值观显著影响民众志愿参与的可持续性，而个体功利化考量对志愿存续并未形成显著作用^[13]。王瑞文等进一步划分文化志愿者动机与绩效的分析维度，讨论不同动机类型对服务绩效产生的差异化影响^[14]。社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重要载体，能够弥补政府直接供给的局限、村级组织力量不足以及市场机制难以覆盖的乡土空间，在乡村治理中承担公共服务供给者、公共政策倡导者、社会价值守望者、社会资本建构者多重角色，助力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建设发展^[15]。

由是观之，相关的理论讨论主要沿三条脉络展开。其一，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研究，多以功能性动机、利他—利己动机等框架解释个体“为何参与”，但多停留在对初始参与动因的解释上，较少回答个体在缺乏物质激励的条件下“何以长期留存”的问题。其二，社会组织运行与存续研究，主要考察组织如何在资源约束中获取外部支持、维持合法性——这为理解文化志愿组织在财政缺位下的生存策略提供了分析资源，但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一般社会组织，对乡土场域中依赖“身份—声望”等非货币资源替代财政资源的特殊机制关注不足。其三，非物质激励与社会资本研究，揭示声望、面子、社会认可在熟人社会中转化为行为动力的机制，为本文以“身份—声望—归属”替代物质报酬的核心命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同时，伴随乡村文化振兴研究推进，部分学者引入“文化嵌入”视角，主张激活社会网络结构中的文化要素，将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嵌入乡风文明建设，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和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16]。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阐释“两个结合”重大论断，赋予了乡风文明建设丰富的时代内涵，要求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完善农村公共文化建

面对乡土教化断层、制度供给不足与引导力量弱化等现实困境,亦有研究提出乡风文明建设应当以重建教化机制、健全村规体系、强化组织保障为核心路径^[18]。

综上,既有研究在乡风文明建设、资源约束、志愿参与与社会组织参与等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留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其一,现有研究多关注财政薄弱乡镇的资源约束本身,较少深入阐释在常态化经费缺位条件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何以实现持续供给;其二,志愿参与动机研究多解释参与动因,对无物质报酬场景下志愿者持续留存、志愿组织长久存续的内在逻辑挖掘不足;其三,学界关于声望、面子等非物质激励的研究尚未与基层文化治理的组织机制相贯通。上述研究缺口,构成了本文拟回应的问题:吴桥镇文化志愿协会在财政薄弱、物质激励缺位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党建引领组织化、专业晋升、表彰与媒体传播的三重机制,实现十余年的持续运转。本文提炼的三重维系机制,既是对吴桥田野经验的归纳,更是对上述理论脉络的整合性回应。

2 研究设计与田野点概况

在进入田野经验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对本文的核心概念与分析视角予以界定,进而厘清研究的分析边界。其一为“财政薄弱乡镇”。本文所指的“财政薄弱”,并非对乡镇整体财政能力的整体性评判,而是聚焦于公共文化供给维度所面临的财政约束:即乡镇尚未将文化志愿服务纳入本级常态化公共文化服务预算体系,缺少固定、可持续的专项文化经费支撑。吴桥镇正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个案,当地文化志愿者协会运行十余年,始终未能获得稳定的财政拨款,各类文化活动的开展高度依赖多元却波动性较强的外部资源。其二为文化志愿服务的维系机制。为避免概念泛化,本文将维系机制拆解为三个联动的层次:一是志愿者个体留存,关注个体初始参与动机向持续参与的转化过程;二是志愿组织的存续机制,落脚于组织合法性建构、内部制度规范与资源汲取能力;三是文化服务持续供给,考察公共文化服务能否接续落地、服务输出能否保持稳定。三重层次各有侧重:党建引领与组织化运作重在保障组织存续,并以此承载常态化的公共文化供给;专业成长通道主要回应骨干志愿者的留存难题;荣誉表彰与媒介传播则面向普通志愿者,维持其持续性参与意愿。三者协同,促成志愿者留存、组织存续与服务供给三者耦合。概言之,本文讨论的维系机制,是一套扎根乡土场域、依托本地稀缺的身份—声望—归属感资源替代物质薪酬的系统。

此外,需厘清文明乡风建设与本研究分析脉络的关联。文明乡风建设的推进,有赖于内生且稳定

的文化供给主体作为基础。财政薄弱乡镇公共文化供给的现实困局,本质上正是内生供给主体缺位所造成。由此观之,探讨文化志愿服务何以能够长期维系,并非将文明乡风建设当作一般性研究背景,而是指向文明乡风落地生根的前置条件,构成本文的分析落点。

本文选取吴桥镇作为田野个案,遵循典型性案例的选择逻辑:其既符合“财政薄弱”的界定条件,又在财政约束下具备突出的本土文化禀赋与相对成熟的熟人社会网络,是考察“无常态化经费条件下文化志愿组织何以维系”的适切样本。

2.1 吴桥镇概况

吴桥镇坐落于扬州市江都区中部,全镇域面积 55.96 平方千米,人口近 6 万人,是一座农耕底蕴深厚、红色文脉鲜明、乡土民风淳朴的基层乡镇。当地产业以粮食种植和设施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地方财力有限,开展公共文化服务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现实困境。但因世代延续务实向善、邻里和睦的农耕民风,也造就了质朴鲜活、烟火浓郁的乡村生活风貌。

作为苏中地区知名的红色革命老区,吴桥镇素有“抗日桥头堡”“苏中小延安”的美誉。抗战时期,陈毅、叶飞、姬鹏飞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运筹战事、开辟抗日根据地,镇域内留存新四军会议旧址、陈毅广场等丰富红色遗存,厚重的红色记忆扎根乡土肌理,成为当地乡风涵养的精神底色。在悠长的乡土发展进程中,吴桥镇积淀了多元共生的本土文化资源,以吴桥社火、地方扬剧、乡村农歌为代表的民俗文艺生生不息,作为常态化群众文艺载体深度融入村民日常生活与乡村节庆场景,构成极具在地特色的乡土文化体系。

区别于多数乡镇依赖外部资源输送的文化建设模式,吴桥镇乡村文化发展呈现本土生长、群众主导的鲜明特征。2013 年当地村民自发组建文化志愿者协会,2015 年正式注册运营,秉持传播文明、传承文化、传递爱心的发展宗旨,深耕基层文化服务十余载。目前协会拥有在册会员 500 余名,下设 18 个专业分会、建有联合党支部,获评中国社会组织评估 5A 级。就协会的经费结构观之,其运行资金主要源自三重渠道:一为固定合作企业的持续性赞助,二为申报扬州市、江都区各级文旅项目所得的专项补贴,三为志愿者参与过程中的无偿奉献与个人自付。访谈中,一位元老志愿者言及,早年“欢乐村村行”巡演结束后,协会尚需走访各村慰问贫困户,慰问物资全部由志愿者自行出资购置;其本人所用电子琴、音响设备亦长期免费供协会演出使

用¹。这提示我们，协会的可持续运行固然有赖于一定的外部资源导入，但更根本的支撑，则来自志愿者以精神满足置换物质回报的乡土奉献逻辑。协会已累计开展各类公益文艺演出、文化服务活动千余场，惠及群众数十万人次，常态化开展的暑期公益学堂、困境群体帮扶、农产品公益代言等服务，持续激活乡村内生活力。依托成熟的民间志愿组织与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吴桥镇形成了农耕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艺相融共生的发展格局，为乡土文化赋能乡风文明建设、实现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转型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

2.2 研究方法与资料

1. 半结构化访谈法

本次调查共完成半结构化深度访谈 10 份，受访对象主要包括镇级负责人、村级干部、志愿骨干、普通志愿者以及村民等。所有访谈录音均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采集，事后逐字转写为文字稿。访谈提纲围绕志愿服务的组织架构、资源获取、日常运作、人员激励、困难挑战等维度设计，并根据受访者不同身份进行针对性调整。

2. 参与式观察法

调查期间，观摩了社火表演、志愿演出，深入吴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村级文化广场、活动室等场所，观察活动的组织流程、志愿者分工、村民参与等情况，并拍摄影像资料作为辅助记录，弥补访谈资料的不足。

3 吴桥镇文化志愿服务的运行机制分析

吴桥镇文化志愿协会自 2013 年开展志愿文化实践，规模由最初数十人发展到五百余人，在常态化财政拨款、志愿者无劳务酬劳的条件下维持十余年的高效运转。正如协会负责人在访谈中谈及：基层文化服务很多时候要靠发动志愿者来做。这也意味着，协会必须跳出物质报酬的激励逻辑，探寻一套能够凝聚、留存志愿者的实践路径。调研发现，协会坚持推进党建引领与组织化，打造专业晋升通道，做好荣誉表彰和媒体宣传，三者相互支撑，将个体的参与动机转化为稳定的组织承诺。从受众端看，这套维系机制也确实产生了村民可感知的文化福利。部分村民仍能回忆起早年“欢乐村村行”巡演“每场演出到场村民数量很多”，并认为常态化

进村演出对村民思想、邻里相处存在积极引导作用²。

需要先行澄清的是，吴桥镇文化志愿者协会并非完全脱离外部资源支持。结合田野事实来看，协会的运转资金来自本地企业赞助、文旅项目专项补助以及志愿者个人自筹等多元渠道。由此观之，协会所匮乏的，是纳入制度框架的常态化财政保障，而非所有类型的外部资金。但其存在显著局限：资金体量有限，且依附于项目周期与市场主体的捐赠意愿，不具备稳定、可预期的持续性。企业赞助多用于维持组织基础运转，项目补贴专款专用于特定文化活动，志愿者个人投入则带有临时应急与道德自觉的属性，三者都难以承担组织日常维系的基底功能，无法取代精神激励在组织常态化运行当中的核心位置。因而吴桥经验的要义，在于依托这套精神激励体系，弥补常态化财政供给与稳定物质支持的双重缺失。这一前提辨析，构成理解后文三重维系机制的基础。

3.1 坚持党建引领与组织化运行

党的领导始终是乡村振兴与基层文化治理的重要前提，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新时代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具有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19]。协会于 2016 年成立党支部，7 名党员中由 5 名经济条件较好的党员直接结对帮扶困境儿童，党支部的建立不仅为协会提供了组织合法性，也让分散在各分会的志愿者有了统一的价值引领和组织归属。

综观协会依托党建引领展开的组织化实践，可得出两个互为支撑的维度：其一为价值引领维度，借助支部建设与党员骨干的示范带动，培育“不计得失、无私奉献”的组织文化，凝聚群体层面的价值共识；其二为组织制度维度，依托社会组织正式登记注册、下设专业分会以及搭建内部议事规则，为整套精神激励体系提供制度化的运行载体。价值引领回应的是志愿者“何以愿意持续参与”的动力来源，组织制度则回答了个体道德热情“何以转化为稳定、可再生产的组织行动”这一问题，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组织存续的基础。

访谈中负责人提到：管理层并非居于“指挥者”位置，而是作为“行动者”率先垂范³。大型活动中舞台搭建、设备搬运、会场布置等繁重工作，均由负责人和党员带头完成。这种行动上的示范效应远比口头动员更具感召力。志愿组织内部缺乏物质利

1 受访人：吴桥镇文化志愿者协会成员，谢桥村村民，男；访谈人：刘韵澈；访谈时间：2026 年 7 月 10 日；访谈地点：谢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参见《江苏农村社会调查文集：吴桥特辑》第 25 期，（内部刊物）

2 受访人：吴桥镇文化志愿者协会成员，谢桥村村民，男；访谈人：刘韵澈；访谈时间：2026 年 7 月 10 日；访谈地点：谢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3 受访人：吴桥镇文化志愿者协会主席张正才，男；访谈人：汪李睿，白子弋；访谈时间：2026 年 7 月 3 日；访谈地点：吴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益的约束,管理者的权威难以依靠薪酬、晋升得以确立,只能依托身体力行来积累道德威望。负责人提及,志愿者参与活动多自行驱车或骑行前往,即使遭遇阴雨天气也照常开展服务,结束后仅有简易工作餐,没有一个人拿一分钱。正是党员和管理层的示范带动,方能培育起这样不计得失的参与热情与氛围。党员不仅在日常活动中冲锋在前,还常以自费方式承担公益支出——协会党支部每年组织全体党员志愿者自费出资,每人出资数百元购置礼品,连续多年于节日慰问留守儿童⁴;在各项活动中,党员亦主动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承担更多组织与带头工作。

协会倡导“一个人就是一个标杆,一个人可以影响一群人”,号召大家从我做起,“不因善小而不为”,依靠标杆个体带动群体,塑造无私奉献的组织文化。据负责人介绍,协会运行 12 年来,五百多个志愿者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矛盾纠纷。组织内部高度的团结信任,是物质激励缺失情境下重要的维系资源,驱动志愿者愿意持续投身各类文化实践。

但乡土情怀不能替代制度建设。2015 年协会负责人个人垫付 3 万元完成民政注册,逐步建立完备内部制度;陆续搭建起涵盖音乐、舞蹈、民间文艺、书画等门类的 18 个专业分会,分会内部自主协调具体事务,重大事项逐级协商处置,由此形成相对完备的基层文化治理组织网络。制度体系为整套精神激励机制提供稳定运行载体:专业人才进阶需要规范的会员管理与推荐程序;声望塑造依托常态化评选机制与宣传平台;党建引领的落地也离不开党支部、党建指导员等组织设置。倘若缺少制度架构,道德感召、荣誉激励只能停留于人情纽带维系的松散群体,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组织行为。可以说,组织化建构是精神激励机制得以长久生效的前置条件,它将个体碎片化的道德实践,转变为可复制、可预期的组织行动。

3.2 打造专业身份晋升通道

组织框架搭建完成后,还需要适配的激励机制维系志愿者的持续参与。受城乡文化资源分配不均衡、基层文艺组织化程度偏低的现实制约,大量乡土文艺爱好者长期缺少制度化的专业认可与向上发展通道。协会将志愿服务参与与文艺人才专业身份晋升直接挂钩,将志愿服务的无偿付出转化为个人专业资质提升的机会。协会推荐会员遵循从区级到市级、省级、国家级的逐级递进路径,推荐标准主要看表演业务能力和志愿参与积极性。

4 受访者:吴桥镇文化志愿者协会成员,谢桥村村民,男;访谈人:刘韵澈;访谈时间:2026 年 7 月 10 日;访谈地点:谢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参见《江苏农村社会调查文集:吴桥特辑》第 25 期,(内部刊物)

这一机制已获明显成效。五百多名志愿者中,市级以上文艺家协会会员已达三百多人,扬州市以上会员一百余人,国家级会员二十余人。在民间文艺这一类别中,整个扬州市国家级会员约六十人,吴桥镇一个乡镇就有十五人,占全市约四分之一⁵。

对乡土文艺爱好者而言,专业身份晋升是把无偿奉献转化为专业成长。通过文化志愿服务打通体制化晋升通道、获得正式身份认可。这种专业身份带来的深层的精神激励与社会声望,回应了乡土文艺群体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进一步激发志愿者的主体性。换言之,协会提供了一种乡土社会内部稀缺的公共资源——体制化的专业认可。这种认可既惠及志愿者个体,也为协会积累了相对稳定的核心骨干力量。

3.3 表彰与媒体宣传:塑造社会声望与社会认可

专业晋升更多回应骨干志愿者的身份诉求,而表彰和媒体传播则面向广大普通志愿者,回应其被社会承认的现实需要。协会每年开展优秀志愿者评选,向志愿者颁发荣誉证书、发放小型纪念奖品,但不发放物质奖金。负责人说得很清楚:“我们主要就是精神激励”“本来就没有经费⁶”。在熟人社会语境下,志愿者的付出被周遭社群感知,进而收获相应的社会声望。荣誉载体的物质价值微弱,但是其所承载的公共评价,能够在乡村熟人网络中展现出现实社交回报,转化为持续参与的内在驱动力。

表彰是在协会内部和熟人圈层中完成的公开肯定,而想要这份认可向外拓展,形成更广范围的社会影响,则需要媒体的力量介入。大众传播媒介能通过长时间的持续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转变受众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在引导农民改变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方面具有独特作用^[20]。协会运营抖音、新闻号、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同时主动对接新华社等外部官方媒体进行宣传,外部媒体报道有限时,则依靠自有新媒体平台完成事迹传播。这种“官方媒体+自有新媒体账号”的双重宣发渠道,确保志愿者的事迹得到持续性呈现。田野材料亦印证了上述机制。协会负责人坦言:“每次活动都尽量报道宣传,即使外部媒体报道不了,我们也利用自身资源发布简讯,来提升志愿者们的认可度和影响。”在乡土社会中,这种公开报道关乎面子和声望,对中老年志愿者而言“这种社会性认可有时比金钱更有吸引力”,由此强化其身

5 受访者:吴桥镇文化志愿者协会主席张正才,男;访谈人:汪李睿,白子弋;访谈时间:2026 年 7 月 3 日;访谈地点:吴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6 受访者:吴桥镇文化志愿者协会主席张正才,男;访谈人:汪李睿,白子弋;访谈时间:2026 年 7 月 5 日;访谈地点:吴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份认同与持续参与意愿；持续曝光也形成隐性公共监督，促使协会保持规范运作。更进一步，协会的国学讲堂等项目先后获评“扬州市优秀志愿服务项目”“江苏省社区教育品牌项目”，被新华社等数十家媒体报道，整体放大了志愿者的社会声望。可见媒体宣传可经熟人社会与公共舆论的双重评价，将精神付出转化为可感知的社会承认，成为志愿者持续参与的内在支撑。

综上所述，三重维系机制构建了具有明确层次与协同关系的系统：党建同组织化运行构成第一层次，是整个激励体系得以生效的基础载体。若缺少正式注册、分会架构与议事制度，道德感召与荣誉激励只能停留于人情纽带维系的松散群体，难以转化为稳定的组织行为。专业晋升与表彰媒体传播构成第二层次，是激励体系本身：前者以体制化身份认可回应骨干志愿者的成长诉求，后者以熟人社会中的声望回报维系普通志愿者的持续参与。二者共同作用于第三层次——志愿者的留存与服务的持续供给。由此，组织化兜底、激励机制驱动、留存与供给输出，三者环环相扣，在物质激励缺位的条件下保障了志愿队伍稳定、文化活动接续、公共文化服务持续输出。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扬州市江都区吴桥镇文化志愿者协会为典型个案，依托半结构化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的质性研究方法，立足于文明乡风建设的分析视域，考察财政薄弱乡镇文化志愿服务的长效维系机制。基于三重维系机制，可引申出三条可落地的实践路径。第一，在组织建构层面，以基层党组织为牵引，推动志愿组织完成规范化登记、搭建专业化分工架构，依靠制度化的组织框架为精神激励提供依托，防止组织长期依附人情网络，陷入松散化、流动性强的困境。第二，在激励设计层面，积极联动各级文艺类协会，为乡土文艺骨干搭建由镇、区、市向上延伸至省级乃至国家级的专业成长阶梯；与此同时，搭建低成本、易推广的常态化表彰机制，借助荣誉授予、阵地公示等形式，让志愿者的奉献行为获得可见的认可。第三，在媒介传播层面，搭建主流媒体联动与自有新媒体账号并行的二元传播渠道，推动志愿事迹跳出熟人圈层持续传播，将个体的志愿行动转化为稳定且可感知的社会声望。

在乡风文明建设纵深推进的当下，如何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实现乡土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依然是基层文化治理的普遍性命题。已有研究从生产方式视角切入，乡风文明建设凸显人在文明演进中的主体性，其生成遵循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深层逻辑，须充分发挥党和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21]。吴桥镇文化志愿者协会的实践表明，财政薄弱乡镇可以依靠

文化志愿服务补足公共文化供给短板。党建引领赋予组织合法性与组织能力，夯实组织运行根基；多层次精神激励机制激发志愿者主体性，依靠乡民自身完成文化生产，再将文化成果反哺地方民众。立足文明乡风的分析视域，该案例向我们展示民间文艺力量的运作逻辑与基层文化治理智慧，能够为乡风文明建设、乡土文化保护、乡村善治提供本土实践参照。

同时，对吴桥经验的考察也须保持审慎的辩证立场。首先，“低成本”并不等于“零成本”。这套供给模式的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将运行成本转嫁给志愿者个体：负责人曾个人垫付注册经费，党员志愿者时常自费购置慰问物资，志愿者自购设备无偿供协会使用。精神激励体系的维系，事实上建立于部分志愿者经济牺牲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它有其内在的可持续性边界：一旦志愿者的经济负担超出其承受能力，或组织长期缺乏对这类“隐性投入”的制度性补偿，激励机制就可能松动。其次，吴桥经验依赖特定的本土条件，即较为成熟的熟人社会网络、深厚的红色文化与民俗文艺禀赋、以及相对稳定的在地人口结构。因此，本文结论的适用边界应限定为“具备一定文化禀赋与熟人社会基础的财政薄弱乡镇”，不宜简单推广至人口持续外流、乡土人际网络趋于松弛的广大乡村。如何在这类条件下重塑激励载体，正是后续研究可以接续探讨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傅才武,刘倩.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背后的体制溯源——以文化惠民工程为中心的调查[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47-59.
- [2] 郑百灵,周龙仁.欠发达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调查与思考[J].求实,2006,(11):42-45.
- [3] 徐平.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J].科学社会主义,2006,(1):56-59.
- [4] 李晓娥,胡尊让,周婷.新时期陕西乡风文明建设探讨[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111-114.
- [5] 董欢.乡风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J].兰州学刊,2007,(3):75-78.
- [6] 赵增彦.当前经济欠发达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J].前沿,2010,(13):116-120.
- [7] 李长学.“乡村振兴”的本质内涵与逻辑成因[J].社会科学家,2018,(5):36-41.
- [8] 陈晓霞.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文化建设[J].理论学刊,2021,(1):141-149.
- [9] 徐学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的

- 意义及其路径[J].中州学刊,2018,(9):71-76.
- [10] 刘欢,韩广富.后脱贫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现实价值、发展境遇及路径选择[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149-158.
- [11] 刘盛.乡风文明与乡村振兴:重要意义、现实难点与关键举措[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8,17(5):629-634.
- [12] 赵廷阳,张颖,李怡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风文明建设——基于全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典型案例案例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3):46-53.
- [13] 崔岩.当前我国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42(3):98-115+131-132.
- [14] 王瑞文,王哲,王梦莹.文化志愿者服务动机对其服务绩效的影响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8):57-67.
- [15] 于健慧.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功能、挑战、路径[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9(6):18-24.
- [16] 唐兴军,李定国.文化嵌入: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与现实路径[J].求实,2019,(2):86-96+112.
- [17] 刘雪丰,刘璐.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价值蕴涵与具体实践[J].湖南社会科学,2023,(5):17-24.
- [18] 吴晓利,韩东云.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探析[J].农业经济,2026,(8):64-66.
- [19] 韩广富,刘欢.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逻辑理路[J].理论探讨,2020,(2):137-143.
- [20] 李容达,李志明.大众传播媒介助力乡风文明建设研究[J].理论视野,2022,(12):57-61.
- [21] 何华征.论生产方式视域下乡风文明的生成机制与建设路径[J].现代经济探讨,2024,(2):109-118.

Maintenance Mechanisms of Cultural Volunteer Service in Financially Weak Townshi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 Field Study in Wuqiao Town

Wang Lirui, Bai Ziyi, Lin Zhiyi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bstract: Under the goal of building civilized rural customs an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urban-rural disparities in resource provision, financially weak townships face a fundamental challenge: sustaining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the absence of regular funding. Taking the Cultural Volunteer Association of Wuqiao Town, Jiangdu District, Yang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as a field case and drawing 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that have sustained the association's operation for over a decade with no routine fiscal appropriation and no monetary compensation for volunteers. The findings identify a threefold maintenance mechanism—Party-building guidance and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fessional advancement, and commendation combined with media coverage. Party-building guidance and institutional norms supply organizational belonging and an operational vehicle; the professional advancement channel converts unpaid dedication into institutionalized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commendation and media coverage amplify volunteers' social prestige within the acquaintance-based rural society. Together, these elements substitute the scarce rural resources of "identity, prestige, and belonging" for material compensation, generating a low-cost, endogenous path for cultural service provision. The study offers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similar financially weak townships seeking to cultivate cultural volunteer organizations and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zed rural customs.

Keywords: construction of civilized rural customs; cultural volunteer service; maintenance mechanism; financially weak townships